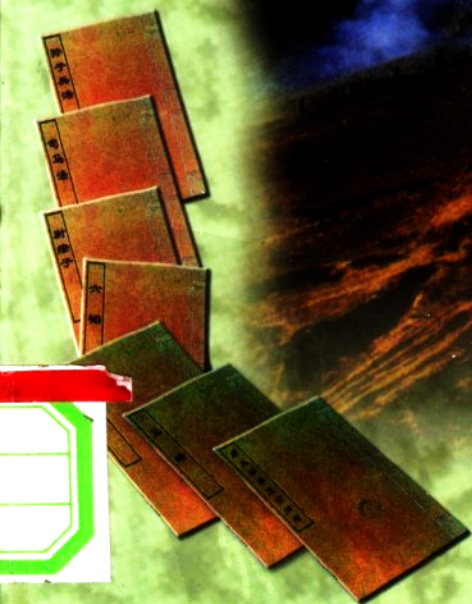


《武经七书》 与当代战争战略

陈相灵 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

《武经七书》与当代战争战略

陈相灵 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经七书》与当代战争战略/陈相灵著. —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3. 9

ISBN7-5626-1264-1

I. 武… II. 陈… III. ①兵法-中国-古代②武经七书-应用-战争-现代 IV. E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0946 号

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红山口甲 3 号)

邮编:100091 电话:(010)66769235

北京登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5

字数:278 千字 印数:3000 册

定价:1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陈相灵 1960年12

月出生，陕西岐山人。军事学硕士，现为国防大学战略教研室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多年从事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外军事思想比较、当代战争等课题的研究与教学。曾多次参加《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墨学国际研讨会、中国鬼谷子学术研讨会。在军内曾参加21世纪初中国军事战略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先后在《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军事历史》、《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未来与发展》、《中国国防科技信息》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曾两次接受中央电视台《国防时空》栏目专访，撰写上报总部的研究报告多篇。

ALL 2010

序 言

陈相灵同志所著《〈武经七书〉与当代战争战略》一书即将付梓面世了，这是一件十分值得庆贺的事。在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今天，在世界各国都面临军事战略重大调整的关键时刻，作者遵循“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应用《武经七书》的思想精华，对当代战争战略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探索，在古老的兵法理论和重大的现实战略之间，架起了一座联结的桥梁。这种尝试无疑是大胆和有益的。

《武经七书》是中国古代兵法的精华，也是哺育民族智慧的教科书。“七书”作为“武经”的颁定是同封建社会武学的兴起和武举的重设紧密相联的。宋王朝建立伊始，为了消除唐末五代以来武夫犯上作乱的恶习，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一方面解除将帅的实际权力，中断了始于唐代的武举制度；另一方面加大对兵书的查禁力度，窒息了学术研究的空气，造成士大夫讳言兵事、武将缓带轻裘、武备废弛、十战九败的局面。为了迅速扭转军事上的被动局面，宋朝政府重建武学，再设武举，加强军事人才的选拔和培养。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宋神宗“诏于武成王庙置武学，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同年七月，神宗再次下诏，对武学的招生限额、学籍管理等做出了明确规定。武学建立后，需要一套完整的军事理论教材，同时武举考试也需要规范的教科书。为此，宋神宗于熙宁八年（1075年）下令枢密院，组织力量校理存世兵书，并且对其进行“分类解释”。元丰三年（1080年）夏，又诏令国子监组织人力，“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

法》、《三略》、《尉繚子》、《靖李问对》等书，镂版行之”。这项巨大的工程历时三年，于元丰六年（1083年）始告完成，并由宋神宗亲自诏令，颁行武学，称之《武经七书》，“立之学官，亦以之试士”。明朝初建，为选拔和培养军事人才，明太祖即敕令军官子弟习读兵书，并命令兵部重刻《武经七书》，发给附监读书的公侯、驸马、伯、都督以下武职子孙。清王朝建立后，仍沿袭宋明旧制，以《武经七书》试士，规定只有通晓《武经七书》者，方能临期试用。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武经七书》成为武生跻身军界的阶梯，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广大考生刻苦诵读，蔚然成风。

随着武学、武举制度的健全和发展，宋朝政府还置武学教授，设武学博士，加强对《武经七书》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武学博士，就是受诏校定“七书”的何去非。此人博览群书，精通兵法，在任武学教授期间，著有《司马法讲义三卷》、《三略讲义三卷》。国子监司业朱服也曾奉诏校定“七书”，他建议去掉对“七书”“浅陋无足采”的全部注释，只印行原文，使读者有一个广阔研读和思考的空间。宋代的施子美是中国历史上对《武经七书》进行统一注释的第一人。施氏“年少而升右庠，不数载而取高第，为孙吴之学者多宗师之”，他所著的《七书讲义》，内容丰富，注释精当，颇见功力。施氏之后，历代注家蜂起，新作纷呈，其中震骇后世的佳作当首推明代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刘氏在完成对“七书”的直解中，已经开始隐现出现代人的一些思想观念和意识，采取字解与意解相结合的方法，“师其意而不泥于古”，在挖掘其思想精华为实现服务方面做了初步的尝试。同时，他还采取以事实相参证的方法，广征博引，融会贯通，“开卷读之，不待师传而自会其意”，被誉为“武经善本”、“兵家之宝”。

然而，《武经七书》毕竟是封建社会军事理论的代表作，其中既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要使这部古老的兵家圣典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时代的青春，关键要“述往事，知来者”，

立足现实研究历史，找准“古”和“今”的接合点，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一座联结的桥梁，把历史智慧变为现实智慧。而这个过程就是毛泽东所倡导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要重视吸取历史智慧。古人说得好，“明镜可以照人，古事所以知今”，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史上，有许多“总括前踪，贻诲来世”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笔规模恢宏、弥足珍贵的宝贵遗产。历代治国安邦的仁人志士都重视对这笔宝贵遗产的继承，重视从历史智慧中汲取营养。早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执政的周公就教诲年幼的周成王要以史为鉴，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汲取经国治军智慧。汉高祖刘邦夺取天下后，即命陆贾考察秦二世灭亡的教训，阐述古今成败之因，寻求历史借鉴。三国时期，以“能明古学”而著称的曹操，在其一生中，“御军三十年，手不舍卷，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因而其勒马疆场三十余年，“因事设奇，满敌制胜，变化若神”，成就了一代枭雄的伟业。与其同时代的孙权，也曾以汉光武帝刘秀领兵作战手不释卷以及曹操“老而好学”的精神，劝部将吕蒙“急读孙子”。唐太宗李世民一生酷爱读史，声称史书使他若“神交千祀之外”，“临睨九皇之表”，“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改革开放和世界军事变革的新形势，江泽民同志深刻地指出：“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汲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综上所述，重视历史是一个国家、民族自信心的集中表现，不论是小农社会还是工业社会，只要有民族的生聚就会有历史的回忆。重视历史又是一个国家、民族凝聚民心的粘合剂，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历史情感不仅能激发一个民族振

兴图强的勇气，而且会为民族提供把历史智慧变为现实智慧的机遇。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言：“历史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于个人一样，一个人丧失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其次，要善于吸取历史智慧。善于吸取历史智慧反映了科学的史学方法论。俄国著名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指出：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进步的。研究方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就开拓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食古不化、坐而论道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那种通行的、语录式简单类比的研究也是肤浅的；而那种肢解历史、影射现实的研究更是有害的。正确的方法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毒素”。树立明确的现代意识，带着现实存在的问题，从历史智慧中吸取营养，寻求借鉴，达到“知往察来，以史昭世”的目的，是我们应采取的正确方法。

相灵同志的《〈武经七书〉与当代战争战略》一书，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方面不吝笔墨，用功颇深。他在积多年研究和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武经七书》的思想精华加以筛选，披沙拣金，服务当代，为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汲取古代兵法的智慧，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提供了一条便捷之道。同时，作者将现代意识融入自己的研究中，立足现代战争战略的热点问题，以信息时代的军事变革为坐标，以二战以来特别是近几场局部战争实践为基础，纵横贯通，古今相参，全方位地透视当代战争，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认识当代战争战略问题的新视角，从而增强了当代战争理论的历史厚重感。在写作方面，作者突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偏重于注释为主研究“七书”的传统，运

用现代科学技术的丰硕成果，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研究方法，采取古今结合，纵横比较的方法，对当代战争战略问题进行了历史的观察和思考，在把历史智慧变为现实智慧方面所做的探索，尤其是值得称道的。

相灵同志的治学同他的为人一样，朴实无华，他即将奉献广大读者的这本《〈武经七书〉与当代战争战略》一书，犹如一坛陈年佳酿，须待以时日慢慢品尝，方能体味出个中的甘醇。因此，我非常乐意将《〈武经七书〉与当代战争战略》一书推荐给广大读者。

我同相灵有过一段师生之谊，他要我在书前写几句话，也算是谬托知己的意思，虽却之再三，还是说了上面这些话，权以为序。

刘书忠

二〇〇三年六月十六日

目 录

第一章 《武经七书》及当代战争战略概述·····	1
第一节 《武经七书》的历史渊源·····	1
第二节 《武经七书》的历史地位 ·····	10
第三节 《武经七书》与当代战争战略 ·····	16
第二章 《孙子兵法》 ·····	20
第一节 《孙子兵法》概述 ·····	20
一、孙子与《孙子兵法》 ·····	20
二、孙子与齐鲁文化 ·····	26
第二节 《孙子兵法》精粹 ·····	29
一、知胜之道 ·····	29
二、诡诈之道 ·····	33
三、全胜之道 ·····	36
四、称胜之道 ·····	39
五、奇正之道 ·····	41
六、虚实之道 ·····	45
七、速胜之道 ·····	49
八、安国之道 ·····	52
第三节 《孙子兵法》应用研究 ·····	57
一、当代西方战争理论中的“道胜” ·····	57
二、“非对称战争”的复杂性与战场控制·····	62
三、“王霸之兵”与“绝对安全” ·····	68

第三章 《司马法》	73
第一节 《司马法》概述	73
一、《司马法》的成书过程	73
二、司马穰苴与《司马法》	75
三、齐威王与《司马法》	77
第二节 《司马法》精粹	79
一、“以战止战”的战争观	79
二、“忘战必危”的安全观	86
三、“同患同利”的联合思想	88
四、“兵不杂则不利”的装备思想	90
五、战争制胜之道	96
第三节 《司马法》应用研究	102
一、当代战争中的“以战止战”	102
二、当代“联合战略”的重大契机	107
三、高技术武器多样化发展趋势与“等齐” 战略	111
第四章 《尉繚子》	116
第一节 《尉繚子》概述	116
一、《尉繚子》的源与流	116
二、尉繚子与梁惠王	118
第二节 《尉繚子》精粹	121
一、贵在“人事”的战争观	121
二、“兵胜于朝廷”的政胜之道	125
三、“先发制人”的兵胜之道	128
四、“制必先定”的精兵思想	134
五、“举贤任能”的将略思想	138
第三节 《尉繚子》应用研究	145

一、“政胜”与国家安全模式的创建	145
二、现代军制改革的优先效应	148
三、“先发制人”战略的发展趋势	153
第五章 《六韬》	159
第一节 《六韬》概述	159
一、《六韬》与姜太公	159
二、《六韬》的作者及成书过程	164
三、《六韬》的思想体系及其特点	167
第二节 《六韬》精粹	169
一、以谋为本的“文事”思想	169
二、“文攻武备”的用兵思想	177
三、“科学统御”的作战指导思想	187
四、丰富、系统的战术思想	193
五、“寓兵于农”的国防思想	196
第三节 《六韬》应用研究	198
一、“天下同利”与“单边主义”策略	198
二、“韬光养晦”的战略价值	202
三、“文伐”在军事斗争中的应用	204
四、“寓兵于农”的国防发展战略	209
第六章 《吴子》	212
第一节 《吴子》概述	212
一、《吴子》的成书过程	213
二、吴起与《吴子》	214
第二节 《吴子》精粹	218
一、吴起的战争观	218
二、吴起的国防思想	224
三、吴起的作战思想	228

四、吴起的治军思想·····	232
第三节 《吴子》应用研究·····	241
一、当代大国防的“固心战略”·····	241
二、未来战争中“简募良材”的战略价值·····	244
三、当代“教戒为先”的三大模式·····	248
第七章 《三略》·····	253
第一节 《三略》概述·····	253
一、《三略》的成书过程·····	253
二、张良与《三略》·····	256
第二节 《三略》精粹·····	263
一、“恃贤与民”的攻略思想·····	263
二、“刚柔相济”的谋略思想·····	269
三、“释远谋近”的战略思想·····	273
四、控制战略要地的用兵思想·····	275
五、将士并重的治军思想·····	278
第三节 《三略》应用研究·····	284
一、“恃贤”战略与国家安全·····	284
二、“刚柔相济”的谋略与国际战略平衡·····	289
三、“释远谋近”的战略与国际战略空间·····	292
第八章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299
第一节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概述·····	299
一、唐太宗与《唐李问对》·····	299
二、李靖与《唐李问对》·····	304
第二节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精粹·····	307
一、奇正之道·····	307
二、虚实之道·····	313
三、主客之道·····	316

四、分合之道·····	319
五、攻守之道·····	320
六、蕃汉之道·····	327
第三节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应用研究·····	330
一、当代战争中的主客之道·····	330
二、当代战争中的攻守之道·····	340
三、“蕃汉一家”的思想在地区冲突中的 时代价值·····	343
主要参考书目·····	346
后 记·····	348

第一章 《武经七书》及当代战争战略概述

《武经七书》是中国古代兵学的精华。它的编纂，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体系化的形成，标志着武学首次成为封建王朝的经学。从此武学与儒家经典并驾齐驱，这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武经七书》所包含的丰富内容，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古老的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惟一把古代文明连续承传下来的国家，与它博大精深的兵学文化密不可分。当人类进入 21 世纪，中华民族在面临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应付挑战，寻求发展，从《武经七书》中汲取思想精华，将对我们研究当代战争战略，有重大借鉴意义；同时在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方面，《武经七书》将给我们新的启迪、新的勇气和新的智慧。

第一节 《武经七书》的历史渊源

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兵书是最为璀璨的明珠之一。《武经七书》就是众多兵书中的代表作。它编纂于公元 1078 年的北宋年间，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丛书。

《武经七书》从所收篇目而言，《孙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均出自先秦，只有《三略》、《唐李问

对》出自汉唐。为什么到北宋时期，才完成了“七书”的编纂工作，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一、危机四伏的民族矛盾，迫使北宋解除对兵书的禁令

北宋建立之初，在战略上对其威胁较大的是辽和西夏。

辽是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契丹族建立的政权。唐五代时期，贵族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于公元916年称帝，建立辽国。契丹贵族先是占有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域，即今天的黑龙江南北广大地区和蒙古沙漠南北广大地区，此后向南扩张，进入长城以南。特别是从后晋石敬瑭手里夺得幽云十六州，即今天的北京市和山西大同市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之后，其南已到达河北的保定、河间，对北宋造成严重威胁。幽云十六州从战略上讲，是辽进军中原的前进基地。赵匡胤在位时，就规划了收复十六州的谋略：一是赎买政策，“能取库存三五十万，遣使与契丹签约，归还我土地百姓，就当是我用尽钱币赎回”^①。二是以武力收复，“如果对方不依，我将用这些钱财，招募勇士，以武力攻取”^②。赵匡胤在位只有十多年，也未实施他的收复大计。其弟赵光义即宋太宗继位后，于公元979年，乘北宋灭北汉之机，亲率军队伐辽。宋军从太原进兵，一路打过金台顿（河北保定）、歧沟关（涿州西南）后，直逼幽州（北京）城南，并对其形成合围之势。但由于太原战后将士未得到正常休整，军粮不继，又不能速战速决，加上辽派来精锐援军，双方会战于高粱河（北京城西），宋军大败，死1万余人，辽军乘胜追至涿州，宋军丧失大量的资粮军械。

高粱河之战失败后，宋太宗在公元986年乘12岁的契丹主年少，其母萧太后摄政，国内政局不稳的良机再次伐辽。这次兵分三路，初期取得一些胜利，但后因军粮供应不上，将领不合，指

① 《续资治通鉴卷九·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

② 《续资治通鉴卷九·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

挥失误，东路军大败于歧沟关，中路、西路只有退却。退却中爱国名将杨业率领下的西路一支部队与辽大军遭遇，战于陈家谷（山西朔县）。此役以寡对敌，宋军英勇奋战，全部壮烈牺牲，杨业被俘，不屈而死。

两次战役失败之后，北宋统治集团的失败主义情绪日益增长，再也不敢北伐。契丹贵族的铁骑经常蹂躏河东（山西）、河北地区。公元1004年，辽军南下直至距开封不远的澶州，宋朝君臣在危机之中，部分主张迁都金陵、成都，部分主战。在宰相寇准的坚决主张下，宋真宗率兵亲征。当时集结于澶州的军队数十万。辽军虽然号称20万，但宋军士气旺盛，首次战斗，就射杀辽军大将萧挈凛，辽兵退却。这次战争，本可以大获全胜，但由于宋真宗主观上怕战，客观上担心宰相寇准权威太重，危及朝政，加上一些奸臣散布议和的好处，便与辽订立了屈辱的和约——“澶渊之盟”：北宋每年向辽赠送绢20万匹，白银10万两，以换取暂时的和平。

西夏是由党项族建立的北方政权。唐末，党项族拓跋思恭参加镇压黄巢农民起义，被皇帝赐姓李。到了宋代，又被赐姓赵。党项族表面上臣服宋朝，但实际上却经常侵扰，对北宋的威胁日益增大。公元1032年，宋仁宗在位期间，赵元昊登上王位，并于公元1038年自称皇帝，国号大夏，在兴庆（宁夏银川）建都。西夏建立之后，其疆土包括今陕西及宁夏、甘肃、内蒙（河套）各一部分地区，成为宋王朝西北方的劲敌。从公元1040年开始，元昊不断发动对宋的战争，多数战役是以宋的失败而告终，宋军每次伤亡都在万人以上。宋在多次失败之后，采取知延州事范仲淹的计策，对西夏实行清野固守的政策：增调禁军20万、厢军10万、乡兵10万，防守陕西；整顿州兵，日夜操练，提高战斗力；争取边境人民，解决田地、耕牛，军民共守。西夏虽然取得胜利，但伤亡不小，得不到实际胜利果实，加上宋对其经济封锁，人民生